

15822.9



彭信威著

中國貨幣史

上冊



2 017 0318 4

中國貨幣史

上 冊

彭 信 威 著

羣 聯 出 版 社



中國貨幣史

下冊

彭信威著

羣 聯 出 版 社

【文化教育】

中國貨幣史

著者：彭信威

*

出版者

羣 聯 出 版 社

上海(11)福州路272弄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〇五五號

總經理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

開本：787×1092 1/25 印張：27 $\frac{1}{2}$ 編號：54-021 字數：612,000

製版者：三和新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175號

印刷者：協興成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1080弄71號

裝訂者：周順記裝訂作

上海惠民路318號

定價：平裝二冊49,000元 印數：平裝1—1500

1954年10月第一版

195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序 言

貨幣史是歷史的一部份，研究貨幣史，總的目的是為幫助理解歷史。

中國的貨幣史，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因為中國的貨幣，有悠久的歷史，他是一種獨立的貨幣文化，而且影響了其他許多國家和民族。

在一般的文化上說來，中國並不算世界最老的。有些文化，如巴比倫和埃及，比中國要早得多。可是他們的遠古沒有貨幣，至少沒有鑄造貨幣。因為近百年來，英法等國的考古家不斷在那些地區挖掘，把各種各樣的古物都挖出來了，運回他們本國，在不列顛博物館和魯佛博物館陳列出來，只是沒有挖到遠古的貨幣，沒有挖到公元前第八世紀以前的錢幣。而錢幣之為物，和其他古物不同：第一它必定是堅固不易毀滅的，這是金屬貨幣的一個優點，第二它必定是數量很多的，因為人人要用他，第三它必定是散佈很廣的，因為各地都要用它。所以只要古代使用過錢幣，一定會被發現。反過來說，如果這許多年來沒有發現巴比倫和埃及古代的錢幣，我們差不多就可以斷定他們在公元前第八世紀以前不會鑄造錢幣。西方最早的錢幣，是公元前第七、八世紀時小亞細亞的里底亞(Lydia)所發行的。這是中國周定王的時候，當時中國已經有錢幣了。

照中國的傳說，中國貨幣的起源，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管子中說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

歷山之金鑄幣。司馬遷說高辛氏以前就有龜貝金錢刀布。班固說神農的時候，就有金刀龜貝。鄭樵甚至進一步說：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但這些人雖然言之鑿鑿，却是沒有根據的。近代的發掘，使我們知道：在傳說中的黃帝和高辛氏的時代，我們的祖先還不會使用金屬，那裏會有金屬貨幣？中國最早的貨幣，的確是貝。這點由中國文字的結構上可以看出來：凡是同價值有關的字彙，絕大部分是從貝；如貧賤等。分貝成貧，貝少為賤。可見在中國文字形成的時候，貝殼已是價值尺度。後來由於真貝的數量不夠，人們就用仿製品：用蚌殼仿製，用軟石仿製，用獸骨仿製，最後用銅來鑄造，這種銅貝就可以說是一種金屬貨幣了。用真貝的時候，以朋為單位，一朋原是一串，後來大概是有一個固定的數目。古詩中有『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的句子。但銅貝出現以後，可能就不再稱朋，而稱孚了。孚是西周以後的重量單位。毛公鼎的銘文中有『取賈卅孚』的句子。賈字有人就釋為貝字，如果是指銅貝，那麼至遲在公元前第九世紀，中國已經有金屬貨幣了。

貝殼在古代是裝飾品，也可以說是一種奢侈品，而且常見於記載，大概發展成爲統治階級之間的貨幣。當時的勞動人民，可能是使用主要的生產工具作爲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鏟、刀、紡輪等。這幾種用具，似乎分別在各地區或各部族中取得一般等價物的資格，而且逐漸脫離了商品世界，形狀也逐漸縮小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就演變成爲正式的布幣、刀幣和環錢。布幣中有一種沒有文字的大型空首布，應當是西周的東西。無論如何，中國鑄造貨幣的起源，並不晚於外國，可能是世界最早的。

中國的貨幣，不但產生得早，而且貨幣的魔力，也發生得早。外國有些人說，中國貨幣雖然產生得早，可是在社會上不發生多大作用，因為流通不廣。這是完全錯誤的。當劉邦做泗水亭長的時候，想到上司家裏去，撒謊說以萬錢爲見面禮，嚇得他的上司迎到門口來。蕭何因爲早年多送了劉邦兩個錢，後來竟加封二千戶。東晉是貨幣經濟比較衰落的一個時代，可是魯褒的錢神論，其措辭的激憤，不亞於千多年後莎士比亞在亞典的梯蒙 (Timon of Athens) 中的黃金頌。南朝時周文郁問卜，卜者告訴他南下可以做到公侯，文郁說，『錢足便可，誰望公侯？』可見貨幣的拜物教，在中國老早就有其根源。

中國的貨幣，不但產生得早，而且是一種獨立的貨幣文化。貨幣的產生，是自發的性質。當交換發展到某種階段，必然會產生貨幣。所以貨幣的起源，原則上都是獨立的。但這只限於極原始的階段。後來生產和交換進一步擴展，使兩種文化水平不同的社會發生接觸的時候，文化較低的民族，就要受到文化高的民族的影響。我們只要看一看古代和近代各國的貨幣史，就可以知道，各國的貨幣很少是獨立發展出來的，而是採用別國的制度。

從貨幣的源流上來說，西方的貨幣，發源於小亞細亞。由小亞細亞向東西兩邊傳播。在東邊，當波斯征服小亞細亞時，他們就學會了鑄造並使用貨幣，而以色列人是從波斯人那裏學會使用貨幣的。在西邊，則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把貨幣文化帶回希臘，並從事鑄造。埃及在被亞歷山大征服之後，才正式鑄造貨幣，所以他初期的貨幣，完全屬於希臘貨幣的系統。就是波斯等東方國家的貨幣，後來也因亞歷山大的征服而希臘化了。羅馬古代曾用過方銅塊，這可以說是他獨立

發展出來的貨幣，但不久就全部吸收了希臘的貨幣文化。至於現代歐美國家的貨幣，又是承襲羅馬的貨幣制度。英國的鎊、先令和便士的體系，便是羅馬的體系通過查理大帝而傳過去的。亞洲回教國家的貨幣，也是脫胎於希臘羅馬的系統。連貨幣單位的名稱也是由希臘羅馬的貨幣名稱所演變出來的。所不同的是希臘羅馬體系的貨幣，多以人像為圖案，而回教國家的貨幣，則因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不用人像為圖案，而以文字和可蘭經的語句為重。在其他形制方面，顯然是希臘羅馬體系。又如印度，在遠古本有獨立的原始貨幣，但自亞歷山大東征以後，北印度一帶的貨幣，就希臘化了。所以世界上，真正獨立發展出來而長期保持其獨立性的貨幣文化是極其少見的。

中國貨幣的發展，脈絡很清楚。基本上沒有受外國文化的影響。我們不談貝幣，因為全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用過貝殼，所以不能說誰受誰的影響。中國最早的鑄造貨幣，除銅貝外，當要算刀布和環錢。而最重要的則是方孔的圓錢。刀布和環錢，都是在中國獨立產生出來的。因為布幣是由古代的農具演變出來的，這種農具有出土，和初期的空首布一模一樣。刀幣也和殷墟出土的刀一樣。這兩種的淵源還可以遠溯到石器時代去。環錢也是一樣，殷墟出土的紡輪，就是這種形狀。至於後來的方孔圓錢，也不是突然其來。秦始皇的半兩，可算方孔圓錢中初期的代表。從形式上來說，他是環錢的變形，所不同的是穿孔的方圓，環錢的穿孔是圓的，而半兩錢的穿孔是方的，這一點當然不會使人疑心他是外來的。外圓內方可能是象徵天圓地方，這正是當時中國的宇宙觀。再從名稱上來說，他不只是環錢的承繼者，而且是布幣的承繼者，因為環錢中有鑄明為一兩十二銖的，布幣中的三孔布，也在背面分別鑄明一兩或十二銖。銖兩正是周秦的重量單位，二

十四銖爲兩，一兩十二銖就是一兩半，小型三孔布背後的十二朱，和秦始皇的半兩錢是同一重量名稱。中國錢幣以重量爲名稱的辦法，一直繼續到唐初。西漢的錢幣有半兩、三銖、五銖，六朝的貨幣有四銖、五銖、六銖。到唐武德四年才改稱寶，或通寶，或元寶，或重寶等，一直繼續到清末。所以中國貨幣的形制，和西方貨幣截然不同：西方貨幣上喜用人物禽獸花木爲圖案，而中國貨幣上，除文字外無他物。甚至如果中國錢幣上發見有飛鳥走馬，大家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用品。因此在中國的錢幣上，也反映了中國文字書法演變的痕跡。先秦貨幣上的文字，可以說是古篆，它和甲骨文不同，是因兩者書寫的工具不同。它之不同於鐘鼎文，乃因爲鐘鼎文是當時文化水準很高的統治階級所寫的，而錢幣上的文字乃各地同鑄錢有關的人所寫的，可以說是民間的文字。秦半兩以後，錢幣上是用小篆。但六朝時已有隸楷的出現，唐代則完全用隸書，或所謂八分書。北宋錢上有行草，太平天国錢上有簡體字。

從紙幣的發展上也可以看出中國貨幣文化的久遠性和獨立性。信用貨幣在中國起源很早。漢武帝時的皮幣已具有信用貨幣的性質。唐憲宗時的飛錢更爲史家所認爲紙幣的濫觴。正式的兌換券產生於十世紀，這就是指北宋的交子。這種交子是分界發行，每兩三年兌現一次，換發新交，所以同現代的紙幣，稍微有點不同，但南宋的會子到了淳祐七年（公元一二四七年）就取消分界的辦法，許其永遠流通，而北方金人的交鈔則在一一八九年就取消了分界發行的辦法，而且不兌現，已經是純粹的紙幣。元初意大利人馬哥波羅從當時歐洲貨幣經濟最發達的威尼斯到中國來，看見中國的紙幣，大爲驚嘆。所以中國是使用紙幣最早的國家。

中國的貨幣文化，不但是獨立發展出來的，而且影響了其他許多民族。大陸上的許多民族，——我們且不說那些曾取得中國統治權的民族，如六朝時的鮮卑（後魏與北周）、宋代的契丹（遼）和女真（金）、以及後來的蒙古和滿族，其他漢化的程度比較淺而中國人沒有替他們編纂史書的民族，如突厥、回鶻、西夏等，當時在軍力上非常強大，常和中國對抗，只因文化落後於中國，也都採用了中國的貨幣文化。他們的錢幣，或用漢文，或用他們自己的文字，但形制上完全和中國錢一樣。亞洲其他國家，如日本、朝鮮、安南、琉球、爪哇等，在古代也是屬於中國的貨幣文化體系。日本自唐代起，就仿照中國的開元通寶鑄造方孔錢，到宋代則輸入中國錢，尤其是明代的永樂錢成了他們的主幣，一直到明治維新才歐化他們的貨幣。安南和朝鮮自宋代起鑄造中國式的錢幣，一直到近代。琉球也曾鑄造中國式的錢幣。南洋有些地方也曾鑄造中國式的銅錢，爪哇則自宋末明初以來，完全使用中國的宋錢。至於中國錢幣所流佈的區域，根據外國的記載和發掘而為我們所知道的，有印度的馬八兒（*Madhar*）、波斯灣的西拉夫（*Siraf*），非洲東岸的索馬利（*Somali Coast*）和贊澤巴島（*Zanzibar*），以及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魯。

中國貨幣文化的影響其他國家和民族，不止表現在錢幣制度上，而且表現在紙幣流通制度上。波斯、印度、日本和朝鮮都曾仿照中國的辦法，發行紙幣。波斯在一二九四年曾實行鈔法。印度在一三三〇到一三三一年間，據說也用過紙幣。日本則自一三三二年起，據說曾發行過幾次鈔票，這些當然是隨着蒙古人的軍力傳播出去的。朝鮮是在明初發行楮幣。

所以中國的貨幣當作一種文化來看，和希臘的貨幣一樣，好像一種有光體，它的光芒，照耀了

周圍的世界。不過希臘的光芒是借來的，他們是借里底亞的光。而中國的光芒，是自己發出來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中國的貨幣，完全沒有受外國的影響，完全是孤立的。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幣制，即在古代，也可能有受外國影響的地方。如戰國時期的郢爰金餅和西漢的白金，都可能是受了外國貨幣的影響，不過這些我們還不能肯定地說。但南北朝時外國金銀幣在中國流通過一事，則是史書所記載的。到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逐漸發達，歐美的銀元流入中國，終至戰勝中國的封建式的貨幣，使中國的貨幣也歐化，那是盡人皆知的事。

中國的社會，自秦漢以下，兩千多年，沒有起本質的變化。自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的勢力伸入中國，才使中國社會有巨大的轉變，但也只有在都市上才看得清楚。在農村，大體上還是停留在半封建的狀態之下。所以本書不能按照社會的發展情形來劃分階段。我也不要像一些外國的經濟學家一樣：把歷史分爲自然經濟時期，貨幣經濟時期，信用經濟時期；因爲本書是以整個貨幣經濟時期爲對象，即自貨幣的產生一直到現代。而信用制度，其實是貨幣制度的一種變化。我也不把殷商以前定爲貨幣經濟前期，殷周到戰國爲貨幣經濟初期，秦漢到清爲貨幣經濟盛期，民國以後爲貨幣經濟晚期。我甚至不根據貨幣的發展情形把殷周劃爲實物貨幣時期，戰國到五代或宋初爲鑄造貨幣時期，宋以後爲紙幣時期，民國年間爲信用貨幣時期。因爲這些分法都有缺點。

本書沿用通俗的辦法，大體上根據朝代來分階段。這種分法也不完全是爲從俗，而有其理由：自從貨幣的鑄造發行權落入統治者的手裏以後，貨幣已成了一種政治制度，一種執行政策的工具，和政治有極密切的關係。朝代的更換，對於幣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換，則改革屬於

例外。中國各代帝王，多不願改變他們祖宗的成法。譬如漢朝的貨幣，顯然和戰國時期的貨幣不同。王莽變制失敗後，光武就恢復西漢的幣制。到唐朝錢制又一變。而宋錢又另具一種風格，制度首尾約略一貫。元明的錢幣也各有其獨特的體制。清錢更是一望即知。所以依據朝代的分法，也是切合實際的。

至於每一階段內研究的內容，則分爲四方面，或四個部門，第一是貨幣制度，第二是貨幣的購買力，第三是貨幣理論，第四是信用和信用機關。

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中國古代的貨幣，是沒有制度可言的。不過假若放寬尺度來說，歷史上各種措施，無論怎樣混亂與不合理，都可以說是一種制度。我們說過去中國的貨幣制度，就是從這種意義上來看。這樣我們可以發見中國的貨幣制度有幾種特點。

首先是貨幣的各種職能，在中國不集中於一體。金銀在中國，自古即是寶藏價值的工具，同時作爲國際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有時也作爲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但中國古代沒有鑄造金銀幣，也不用金銀爲流通手段，流通手段，基本上都是用銅錢。歷代雖有金銀錢的鑄造，但這種金銀錢，只具備貨幣的形式，目的不是爲流通。

銅錢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貨幣的各種職能。可是有些職能，主要不是用銅錢，甚至有時完全不用銅錢，例如寶藏手段，主要是用金銀，銅錢只在一定程度上取得這種職能，而且限於合乎標準的銅錢，不合標準的銅錢，人們決不用作儲藏手段。其中基本的原因是因爲沒有自由鑄造的辦法，這銅錢的購買力和它的幣材價值不符，有時因私鑄關係甚至低於幣材價值，但一般說來，

作為銅錢的價值，高於作為銅塊的價值，而且相差很大。所以銅錢不是一種很好的寶藏手段，這就賦予銅錢一種特殊的性質，使他和外國的金銀幣不同。也就是說，使銅錢的購買力，所受他的數量的影響，要大於金銀幣。金銀和金銀幣并不是完全不受數量的影響；不過因為金銀幣的價值和這些金銀幣的幣材價值約略相等，所以他們是很好的寶藏手段，在使用金銀幣的地方，這種寶藏手段的職能，對於貨幣的數量，可以發生一種調節的作用，因而沖消一部分因通貨數量變動所加於貨幣購買力的壓力。使用銅錢就不大有這種調節作用了。尤其在減重或貶值的時候，人們決不肯把減重或貶值的銅錢儲藏起來，他們知道等到將來，這種銅錢根本用不出去，所以不如現在快點用出去，這樣會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而減低他的購買力。因此中國的銅錢的性質，從他的購買力的變動一點上來，是介乎金銀幣和不兌現的紙幣之間的。這是中國古代貨幣一個重要的特點。只有曉得了這個特點，才能說明中國貨幣史上的許多現象，比如董卓的小錢，最多減重成五分之一，可是使物價上漲約萬倍。梁武帝的鐵錢，以價值來說，至少總有銅錢價值的十分之一，可是他使物價上漲幾百倍。

由於貨幣的各種職能，分別由各種物品擔任，而這些物品之間又沒有一定的關係，所以我們才說：在嚴格上講來，古代的貨幣沒有制度可言。既沒有主幣輔幣的關係，也沒有什麼本位制度。歷代的發言人，喜歡用所謂子母相權一套話，有人說這就是指主幣和輔幣的關係。這話是不對的。我們不知單旗的原意如何，後來的所謂子母相權，只是指各種大小貨幣單位，而不是指主幣與輔幣。古代各種貨幣，都是主幣。所以如果要談本位，那麼戰國秦漢，勉強可以說是金錢

平行本位，六朝隋唐是錢帛平行本位，宋金元至明初是一種錢鈔流通制度，明中葉到清末是銀錢平行本位。所謂平行本位，就是說各種貨幣都可以無限地使用，而彼此間沒有固定的比率，隨市價作盲目的波動。有些朝代，也曾規定比價，但維持不住。

中國貨幣制度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鑄造和流通的地方性，這反映中國社會的封建性。古代錢幣的鑄造，是由各地辦理。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鑄造，幣面多標明地名。唐會昌年間的開元錢、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錢，以及整個滿清兩百多年的錢幣，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鑄，錢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國年間的新式貨幣如銀元、銅元和鈔票等，也由各省鑄造發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國貨幣不但在鑄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戰國時期，三晉用布幣，燕齊用刀幣，周秦用環錢，楚國用蟻鼻錢，割據的局面非常明顯。在三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國那些混亂的時期也是這樣。就是在統一政府之下，貨幣流通的地方性還是嚴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可是幣制上是割據的局面：京東京西十三路行使銅錢，成都等四路行使鐵錢，陝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再說南宋的紙幣罷，東南用會子，四川用川引，兩淮用交子，湖廣有湖會，河池有銀會。這種流通的地方性，到了近代還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國一段時間來說，銀元寶有蘇寶銀武昌寶銀等；虛銀兩則上海用規元，天津用行化，漢口用洋厘。小額銀幣則江浙一帶用廣東的雙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單毫和雙毫，四川用五角銀幣，湖南河南東北則不用小額銀幣，而廣東則專用小額銀幣，而不用大銀元。銅幣則江南各省用單銅板，北方各省用雙銅板，河南用當五十的銅板，四川則專用當百當二百的銅板。就是在實施法幣制度之

後，一時只能在東南流通，廣東仍用毫券，廣西用桂幣，雲南用滇票，至於西藏新疆東北，更是用他們自己的貨幣。一直到抗戰勝利後，全國的貨幣流通，還是不統一，西藏不消說，新疆有新疆的鈔票，東北用東北流通券，台灣用台幣。

中國貨幣制度的第三個特點是鑄造技術的不進步。中國貨幣的鑄造，一向是用手工，即用范鑄，這也是封建社會的特點。用這種原始方法來鑄錢，式樣就難得精美，成色常有參差，而輕重也不易一律。這不是說手工業不能製造出精美的作品。中國正是以手工業藝術聞名世界的，如殷商的銅器，宋朝的瓷器，都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錢幣中，也有很精美的，如先秦的刀布，以及新莽時和宋徽宗時的錢幣，都有水準很高的；書法美，製作精，可算是中國勞動人民藝術天才的成就。但一般說來，中國錢幣的製作，總是比較拙劣的。錢幣學上有些專門名辭如流銅、錯范、傳形、倒書等等，都是在這種原始的鑄造方法中產生的，都會損害錢幣的整齊美觀。至於穿孔有大小、輪廓有闊狹、錢身有厚薄等等，那是連宋徽宗時的錢幣也是免不了的。因此中國錢的板別，多得驚人。例如北宋的元豐，只有短短的八年，但鑄出的元豐通寶，單是日本出版的昭和錢譜所收集到的，就有近三百種。政和宣和等錢，也各有幾百種。這是由於自漢以來，鑄錢多用泥范，幾乎范范不同。這種原始的鑄錢方法，對於私鑄非常方便。在封建統治者的橫征暴斂之下，許多善良的老百姓也被迫從事私鑄。漢武帝時犯私鑄罪判刑的有幾十萬人，參加私鑄的有幾百萬人。唐乾元二年單是長安城中因盜寺觀銅像和鐘來鑄錢而被打死的，就有八百多人。

因為鑄造方法的不進步，所以錢幣的成色就參差得很厲害了。中國古代，分解技術不高，往

往實行所謂卽山鑄錢。這就是說在銅礦附近用原銅鑄錢。銅礦中不但有時含有鉛錫，而且可能含有金銀。所以古代民間傳說某種錢中有白銀，那是完全可能的。十七世紀初日本人已知禁止金銀出口，荷人就輸出日本的銅，因為銅中有黃金。所以中國錢幣有各種各樣的顏色，因為純銅是紅色，若加以鉛錫，則變成青白色，鉛錫所佔比例的大小，決定銅錢的顏色。例如北宋的宣和錢，就有紅銅的，有黃銅的，也有白銅的。而且同是黃銅，又有各種深淺程度不同，又如清代的咸豐錢，福建用紫銅，新疆用紅銅，而其他各省則用各種程度的青銅。

由於鑄造技術的低下，加上私鑄的盛行，使錢幣的輕重很不一律。秦始皇的半兩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代所見的半兩錢，並不都是秦半兩，大部分是漢半兩。漢半兩是有意減重的，我們且不談。一般錢幣學家把錢身厚重文字高挺的半兩錢，認作秦半兩，也可以說大凡在七公分以上的半兩錢，就可以算得是秦半兩。清末有一位金石學家吳大澂就根據八枚秦半兩的平均重量而求出秦的衡法。他的動機是很好的，而且這種事情也很重要；因為中國古代的度量衡若不弄個清楚，則中國的經濟史，幾乎就無從研究起。歷代的耕地面積、出產數量及其價值，都無從比較。不過他所求得的數字是不可靠的。原因就是秦半兩的重量，太不一致了。以庫平來秤：有一錢多的，有兩錢多的，有三錢多的，有四錢多的，甚至有重到六錢多的。因此我們可以斷言：不但有許多半兩錢不夠標準重量，而且有些錢超過標準重量。所以不要說以八枚錢所求得的平均重量，不足用為標準，就是數目更多的錢所平均出來的重量，也不能作為秦衡的標準。我自己曾秤過六十四枚秦半兩，求得的秦兩重量，就和吳大澂的大不相同，而且我的數字，應當比吳大澂的

數字可靠些，但我認為還是不大可用。總之中國的錢幣，輕重很不一律。就是到了清末，還有這種現象。例如光緒錢，照規定最多是一錢重，大部分固然不够這標準，可是也有重到一錢三分的。在近代國家，用新式機器鑄造貨幣，鑄造公差通常只容許千分之三。

貨幣購買力的變動，佔本書的主要部分，這一方面的研究，在中國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嘗試，花的時間最多，佔的篇幅也最多。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貨幣的形制。錢幣學家研究的對象是錢的形狀，錢文的書體，把各代的錢名，像流水賬一樣抄錄下來就算了事，有時連錢的重量和成色都不注意。至於錢的購買力，或爲什麼發行某種錢，發行後對於人民生活有什麼影響，對於政治有什麼影響，那是更加不問了。其實古錢的形制只是古代貨幣的軀殼，他的生命或靈魂是他的流通情形，尤其是他的購買力。他的遺體之值得我們研究，正如化石之值得生物學家研究一樣，那是不可否認的。但如果我們能够從鳥類化石的研究而知道某種鳥在古代是怎樣飛，發出怎樣的叫聲，其壽命如何，對於人類生活有什麼影響等等，豈不是更好麼？另外有些人是研究貨幣的制度，而且也偏於近代的幣制，如銀本位，銀兩的種類，各地銀兩的成色，鈔票的形制等。這些人對於清以前，多是幾句話就帶過去了。他們比古錢學家自然更加接近貨幣經濟學，但其忽視貨幣的購買力及其變動的影響，兩者是沒有分別的。這無疑是資料不易蒐集的緣故，也因爲中國的貨幣理論不發達的關係。貨幣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所以制度的研究，自然很重要，然而貨幣制度的善惡成敗，并不在錢形的美觀與否，而要看貨幣的購買力能否維持，使其不致攪擾人民的經濟生活。以往研究貨幣史的人，多忽略了這一點，對於歷史上的一些重要現象，多不加研究和說明。